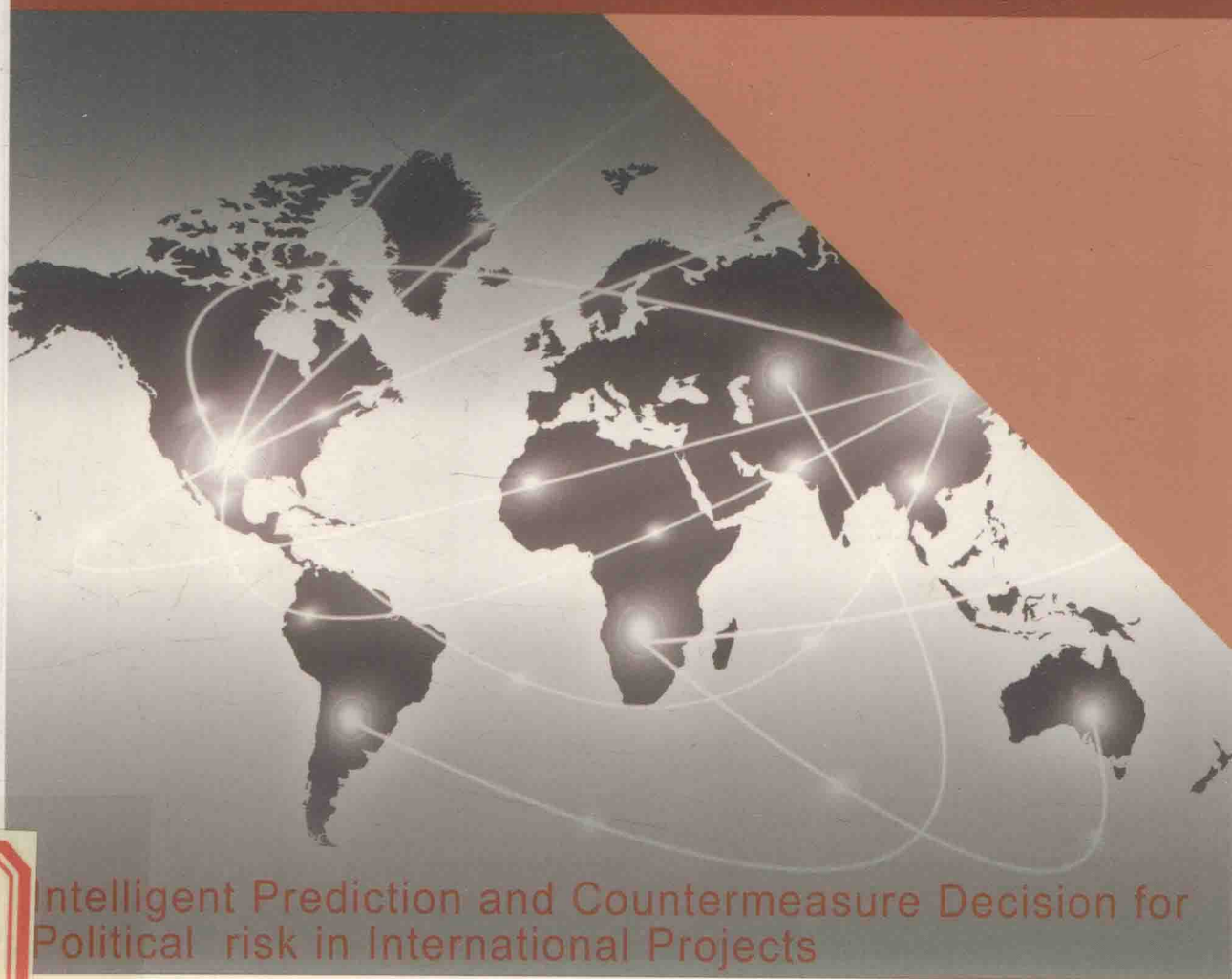


重大工程安全风险管理丛书
国际工程管理前沿丛书

李启明 主编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 智能预测与对策选择

李启明 贾若愚 邓小鹏 · 著



Intelligent Prediction and Countermeasure Decision for
Political risk in International Projects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重大工程安全风险管理丛书 | 李启明 主编
国际工程管理前沿丛书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智能 预测与对策选择

李启明 贾若愚 邓小鹏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中国的国际承包商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的政治风险将会导致国际工程承包商经营环境的改变,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利润带来潜在的巨大影响和不利后果。政治风险必须引起中国国际承包商足够的重视。本书旨在深入揭示国际工程中政治风险的形成机理,探寻政治风险关键影响因素,应用风险传导理论、脆弱性理论、数据挖掘理论、贝叶斯网络理论、系统工程理论等多学科交叉技术对国际工程中政治风险进行预测,对不同风险情景下的风险对策效果进行评价,并在研究过程中结合建筑业的行业特色及“中国因素”,对中国的国际承包商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量化、模拟和实证,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中国承包商在国际工程项目合同签订前后和履行过程中对该项目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中期到短期的风险预测和风险应对。

本书可供国际工程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领域的研究学者及国际承包商的决策人员和项目经理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智能预测与对策选择/李启明, 贾若愚, 邓小鹏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7. 12
(重大工程安全风险管理体系丛书, 国际工程管理前沿丛书)
ISBN 978-7-5641-7494-1

I. ①国… II. ①李… ②贾… ③邓… III. ①国际承包工程—工程管理—风险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F74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2263 号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智能预测与对策选择

著 者 李启明 贾若愚 邓小鹏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责任编辑 丁 丁
编辑邮箱 d.d.00@163.com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9.5
字 数 231 千
书 号 ISBN 978-7-5641-7494-1
定 价 38.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传真): 025-83791830

作者简介

李启明，博士、教授、博导。现任东南大学建设与房地产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PPP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建筑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担任全国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和物业管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程管理硕士（MEM）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数字建造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建筑与房地产经济学术委员会主任等。

长期从事国际工程管理、工程风险管理等教学、研究和实践，主持《基于DFS的地铁工程全生命周期安全风险智能化预控方法研究》《地铁施工安全风险实时预测方法研究》等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和国家自科项目5项，以及部省级科研项目、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等50多项。主编出版《国际工程管理》《土木工程合同管理》等专著和教材15本，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其中SCI/SSCI论文30多篇。担任《工程合同管理》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工程管理》国家特色专业负责人。2014年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2016年获中国建筑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贾若愚，1988年生，河南鹤壁人，中共党员。2016年8月毕业于东南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碧桂园集团。

研究领域：工程项目管理，国际工程管理，项目风险管理。

联系方式：jia_ruoyi@163.com

作者简介

邓小鹏，博士，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设与房地产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200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5.2-2005.11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助理，2011-2012年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研究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理事、东南大学PPP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民建江苏省第八届委员会科教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际高铁项目瞬时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动态度量及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71771052）（2018-202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际工程中政治风险的集成度量及智能决策研究：理论、实证及应用》（项目编号：71372199）（2014-2017）、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保障性住房建设PPP模式应用研究》（项目编号：09YJCZH014）（2010-2012）、解放军总后勤营房部课题《地下空间开发安全风险管理的的方法研究》、江苏省优势学科资助项目《精益理论在公共建筑设施管理中的应用研究》等课题。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SCI 3篇，SSCI 3篇，EI 7篇，CSSCI 10篇），出版著作、教材14本。担任多个国际期刊的审稿人：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Habitat International、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KSCE Journal of Civil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JCM)。

研究领域：风险管理、安全管理、可持续建设、国际工程管理、房地产及住房保障。

联系方式：dyp@seu.edu.cn

责任编辑：丁 丁

责任印制：周荣虎

封面设计：王 珏

总 序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富民安民的基础产业。与其他安全风险较高的行业(例如航空业、石化工业、医疗行业等)相比,建筑工程事故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其发生频率相对较高,危险源类型具有多样性。工程安全一直是项目管理人员和相关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虽然建筑工程事故率的不断下降表明工程安全管理水平正在逐步提升,然而频繁发生的工程伤亡事故还是说明工程安全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与“零事故”(Zero Accident)或者“零伤害”(Zero Harm)的终极目标相去甚远。相关研究表明,建筑工程现场的工作人员受伤或者死亡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其他行业。从事建筑工程的劳动力约占总数的7%,但是其伤亡事故却占了总数的30%~40%。高事故率是全球建筑工程面临的普遍问题,建筑工程人员工作的危险系数相对较高,其生存工作环境相对恶劣。研究发现,如今愿意从事建筑工程生产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重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建筑行业糟糕的工作环境和相对较高的事故率,使得年轻人对此行业望而却步。目前,建筑行业的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作为劳动密集型的建筑行业如果老龄化趋势继续延续,整个建筑产业的萎缩将是必然的。因此,为了能够使建筑业持续稳定发展,改善其工作环境,提高工程安全管理绩效显得十分重要,这样才能吸引年轻人返回这个古老的行业,给建筑行业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与传统建筑工程相比,重大工程(Megaproject)往往具有投资额度大、技术复杂度高、利益相关者多、全生命周期长等特征。随着重大工程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建设内容越来越多,技术(前期策划、设计、施工、运行)难度越来越高、影响面也越来越广,既包括了质量、成本、进度、组织、安全、信息、环境、风险、沟通等内容,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军事等多个层面。近三十年,各种类型的重大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持续开展,例如中国的三峡大坝工程、日本的福岛核电站灾害处理项目、阿联酋的马斯达尔城项目、尼加拉瓜的大运河工程、美国的肯珀电站项目等。保守估计,目前全球重大工程市场的年均生产总值大约为6万亿~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8%。重大工程的持续发展,不断突破工程极限、技术极限和人类操控极限,增加了其安全管理与安全实施的难度,重大工程的安全问题显得尤为突出。1986年4月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第四号反应堆发生的大爆炸、2008年11月中国杭州地铁1号线土石方坍塌事故、2011年7月中国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等一系列重大安全事故,给国家、企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给重大工程发展抹上了无形的阴影。因此,研究如何保证重大工程安全,杜绝重大工程安全事故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一般工程相比,重大工程安全管理对安全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原

有的理论与方法已经难以满足环境和系统复杂性带来的新问题对重大工程安全管理新理论与新方法的渴求,对传统的工程安全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和创新势在必行。本丛书总结了东南大学研究团队多年的研究成果,基于重大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维度,从计划、设计、施工、运营、维护等方面对重大工程安全管理进行全面的阐释。研究重点从传统的施工阶段拓展到包括设计、运营的全生命周期阶段的安全风险管理;从传统安全风险内容深化到安全风险的预测和预警;从一般风险事件聚焦到国际重大工程的政治风险、重大工程的社会风险、PPP项目残值风险等特定风险。本丛书作者来自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海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作者李启明教授、邓小鹏副教授、吴伟巍副教授、陆莹副教授、周志鹏博士、王志如博士、邓勇亮博士、万欣博士,以及季闯博士、贾若愚博士、宋亮亮博士等长期从事重大工程安全管理的研究工作。由于本丛书涉及重大工程安全管理的多个方面,限于作者们的水平和经验,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李启明

2016年10月9日

前言

中国承包商从 1978 年开始进入国际工程市场,经过近四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如今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商务部的统计,2016 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达到 2 440 亿美元,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已成长为超 2 000 亿美元的国际业务。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推进下,将会有更多的中国承包商走向国际工程市场。但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的政治风险也给中国的承包商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这警示着中国的国际工程承包业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遗憾的是,政治风险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中国承包商的海外开拓风险管理计划,甚至就没有政治风险的考量。因此,对国际工程项目的政治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并采取科学的决策势在必行。

政治风险历来是跨国企业在国际扩张中不可回避的热点问题。后危机时代的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与以往相比更加宽泛更加复杂,其形式也更加多样。中国的国际承包商面临更多的制度障碍和更为复杂的政治风险。而现有的政治风险评估体系不正式、不系统、难以胜任、主观性强、可预测性差,并且许多评估方法是反应性的,而非前瞻性的,存在数据获取困难、信息失真、评估滞后等问题。有鉴于此,本书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际工程中政治风险的集成度量及智能决策研究:理论、实证及应用(项目编号:71372199)(2014.01—2017.12),对于国际工程政治风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本书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 对政治风险的定义、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政治风险的评估、政治风险管理、建筑行业政治风险研究、风险评估、控制及决策等相关理论与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与评述。

(2) 对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界定。

(3) 基于风险传导理论和脆弱性理论建立了政治风险的形成框架,并识别出了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

(4) 通过调研收集并分析了 300 多个国际工程政治风险案例,建立了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形成路径的拟合模型。探究了不同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之间对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后果的影响关系。

(5) 将 Logistic 回归模型与贝叶斯网络相结合,建立了国际工程政治风险智能预测模型。

(6) 从政治风险预防和政治风险处置两个方面研究了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对策选择问题,设计了面向承包商的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管理机制。

本书主要特点:

(1) 本书兼顾理论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原则。既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形成机理,又结合政治风险的案例和调研资料,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探讨了应对政治风险的对策。

(2) 本书结合建筑业的行业特色及“中国因素”,对中国的国际承包商所面临的政治风

险进行量化、模拟和实证,能较好地反映中国承包商面临政治风险的状况。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论文和著作,在参考文献中一并列出,笔者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特别感谢中国建筑、中国交建、中国水电、中国中铁、中国电建、中江国际等国际知名建筑业企业对本研究提供的案例支持。感谢课题组成员常腾原、吕冰、张磊和纪延光,本书的成稿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东南大学出版社的丁丁编辑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同时也感谢江苏省优势学科的专著基金资助,使得本书能顺利出版。

限于笔者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书中不足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予以批评指正。

李启明 贾若愚 邓小鹏

2017年10月于东南大学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1.2.1 关于政治风险的相关研究综述	3
1.2.2 风险评估、控制及决策等相关理论与方法综述	6
1.2.3 现有研究的评述及不足之处	7
1.3 研究目标、内容及方法	8
1.3.1 课题来源	8
1.3.2 研究目标	8
1.3.3 研究内容	9
1.3.4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10
1.4 本章小结	10
2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	12
2.1 国际工程的概念及特点	12
2.1.1 国际工程的含义	12
2.1.2 国际工程的特点	12
2.2 国际工程的政治风险的定义与识别	14
2.2.1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与主权风险(Sovereign Risk)	14
2.2.2 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	15
2.2.3 国际工程的政治风险	16
2.3 风险传导理论	19
2.3.1 风险传导概念及其传导机理	19
2.3.2 风险传导要素	19
2.4 脆弱性理论	21
2.4.1 脆弱性的概念	21
2.4.2 脆弱性与风险	22
2.4.3 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性的内涵	22
2.5 本章小结	23
3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识别与分析	24
3.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形成框架	24
3.1.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传导路径	24
3.1.2 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性	24

3.2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识别	25
3.2.1	东道国政治系统的状态	25
3.2.2	国际工程项目的脆弱度	28
3.3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的分析	29
3.3.1	问卷调查综述	30
3.3.2	问卷调查结果	31
3.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35
3.4	本章小结	38
4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案例调研及形成路径分析	40
4.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案例收集	40
4.1.1	问卷设计	40
4.1.2	调研过程	42
4.2	案例基本情况分析	44
4.3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形成路径分析	48
4.3.1	结构方程模型简介	48
4.3.2	理论假设模型	50
4.3.3	模型检验与修正	51
4.4	本章小结	57
5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智能预测模型建立	58
5.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智能预测模型框架	58
5.1.1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智能预测模型基本思路	58
5.1.2	Logistic 回归模型简介	59
5.1.3	贝叶斯网络简介	60
5.2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影响因素筛选和规则提取	63
5.2.1	模型建立	63
5.2.2	模型拟合及拟合结果	64
5.3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国际工程政治风险智能预测模型	72
5.3.1	网络结构建立	72
5.3.2	网络参数学习	75
5.3.3	算例分析	79
5.4	本章小结	80
6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的对策选择研究	82
6.1	基于敏感性分析的国际工程政治风险预防对策选择研究	82
6.1.1	敏感性分析	82
6.1.2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预防对策	94
6.2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处置对策研究	99

6.2.1 系统动力学概述	100
6.2.2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处置对策效果评估 SD 模型构建	102
6.2.3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处置对策效果评估 SD 模型结构分析与方程构建	103
6.2.4 案例仿真	108
6.3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管理机制设计	113
6.3.1 承包商的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管理工作内容	113
6.3.2 承包商的国际工程政治风险管理工作流程	115
6.4 本章小结	116
7 结论与展望	117
7.1 研究结论	117
7.2 创新点	118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119
参考文献	120
附录	133
附录 A 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133
附录 B 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案例调查问卷	135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中国承包商从 1978 年开始进入国际工程市场,经过三十余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如今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13 年,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gineering News-Record, ENR)恢复对全球 250 家国际承包商进行排名(自 1992 年起,ENR 将排名从 250 强缩减到 225 强),这种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有实力的国际承包商规模及数量的迅速增长。在 ENR 2015 年的榜单中,全球 Top 250 承包商海外总营业额达到 5 215.5 亿美元,在国际承包商 250 强榜单中,中国内地企业占有 65 个席位,上榜的 65 家企业共实现海外市场承包收入 896.8 亿美元,比上年度增加 13.5%,占 250 强海外总收入的 17.2%。中国内地企业已经成为国际承包市场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其中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海外营业额将近 158.27 亿美元(ENR 排名第 5)。另据商务部的统计,2015 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企业 4 000 余家;工程项目遍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新签合同达到 2 1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完成营业额 1 54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2%。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已成长为超 2 000 亿美元的国际业务。其中,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 49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 14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2%;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 60 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3 987 个,新签合同额 926.4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44%。

未来,由于中国国内有限的市场容量、建筑产业大量过剩的产能,以及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和推进下,更多的中国承包商将会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国际承包商也会在国际工程市场中承揽更多的项目;同时,更多的国际承包商也会由过去的承包项目向投资项目转变。“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促进中国国际承包商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取得更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市场上,政治风险对中国承包商的影响不容忽视。近年来,政治风险曾给中国的承包商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典型的案例包括: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由于 2013 年 10 月的泰国政局变动而陷入停滞,2015 年中泰双方重启铁路合作项目谈判,但是 2016 年 3 月,泰方单方面宣布完全停止该项目;2015 年,项目总金额约 44 亿美元的“墨西哥城—克雷塔罗”高铁项目,因与中铁建组成联合体的一家墨西哥企业被爆与墨西哥总统家庭存在利益关系,引起反对党和不少民众对于项目的质疑,墨西哥政府宣布取消由中铁建公司组成的联合体的中标;中铁建承建合同金额达 83 亿美元的拉各斯至卡诺的铁路项目因尼日利亚政府的更迭而暂停施工;中资巨型水电工程——密松大坝(投资额约 36 亿美元)被缅甸政府叫停,工地附近还发生多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了中国工人的伤亡;2011 年初开始的利比亚动乱严重影响到中国公司在利比亚所承包的涉及合同金额 188 亿美元的工程项

目。这些案例警示中国的国际工程承包业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遗憾的是,政治风险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中国承包商的海外开拓风险管理计划,甚至没有政治风险的考量;中国政府每年为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投资而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几乎从不涉及对相关国家的政治风险评估和预测。因此,对国际工程项目的政治风险进行有效的预测、评估并采取科学的决策势在必行。

政治风险历来是跨国企业在国际扩张中不可回避的热点问题。政治风险源于政治事件(如革命、政变、内战等)、社会事件(恐怖袭击、抗议等)、政府行为(如腐败、法律变更及政策规制),以及一些强力社会组织的行为(如工会组织的罢工、环境保护组织的抗议行为),导致国际工程承包商经营环境的改变,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利润带来潜在的巨大影响和不利后果。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衰退加速了国家干预市场的趋势,以及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的相互交织,使得政治风险呈现出高发性、破坏性和复杂性的发展态势。正如Jakobsen(2010)的研究指出:现在的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与以往相比更加宽泛、更加复杂,其形式也更加多样。从国有化、战争内乱、恐怖袭击的极端行为,到较为温和的政府干预行为(如政策法律变更、蚕食性征收),以及环境问题导致的公众反对,各种政治风险以更快的速度、多样化的渠道、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非线性、连锁性、跨时空的耦合传播。

国际工程项目具有规模大、周期长和地域性等特点,其政治风险体现出鲜明的行业特色,外在的政治风险同工程项目本身所固有的各种风险结合起来。同时,中国承包商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地区,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还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如:“中国因素”与地区冲突、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相结合(如巴基斯坦、阿富汗、苏丹、缅甸等);“中国因素”与当地的“反华排华”情绪相结合(如印度、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不透明的关系,使得国有企业背景被泛政治化;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对于中国企业的政府介入(Zhang & Alon, 2010)、国有所有权和政治目的(Globerman & Shapiro, 2009),使得中国的国际承包商面临更多的制度障碍和更为复杂的政治风险(Quer, et al., 2012)。

国内一些学者对国际工程和项目风险管理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张水波和何伯森, 2003;张连营和杜京京, 2011;乐云, 2004;王雪青, 等, 2008;付玉成, 2012)。但对于国际工程项目的政治风险关注不够,相应的理论研究极为匮乏。在实践中,跨国企业的政治风险评估的水准非常低,且未能形成制度化的评估。Khattab等(2007)指出:现有的政治风险评估体系不正式、不系统、难以胜任、主观性强、可预测性差,并且许多评估方法是反应性的,而非前瞻性的,存在数据获取困难、信息失真、评估滞后等问题,难以实现对政治风险的主动预测。

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深入揭示国际工程中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 in International Projects)的形成机理,探寻政治风险关键影响因素,应用风险传导理论、脆弱性理论、数据挖掘理论、贝叶斯网络理论、系统工程理论等多学科交叉技术对国际工程中政治风险进行预测,对不同风险情景下的风险对策效果进行评价。

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结合建筑业的行业特色及“中国因素”,对中国的国际承包商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量化、模拟和实证,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中国承包商在国际工程项目合同签订前后和项目进行过程中,对该项目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中期到短期的风险预测和风险应对。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关于政治风险的相关研究综述

1) 政治风险定义

政治风险是一种非常主观和具有业务特异性的风险(Ashley & Bonner, 1987)。由于风险和风险源的多样性(Simon, 1982),虽然政治风险在相关研究和国际商业活动中经常被提及,但是还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确切定义(Fitzpatrick, 1983; Mortanges & Allers, 1996)。

根据文献,政治风险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是将政治风险定义为由于政治事件(Root, 1972)或政府行为(Aliber, 1975)导致不利后果的风险,这种定义重点强调政治介入行为(Zhuang, et al., 1998)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第二种政治风险的定义着重强调经营环境的变化和不连续性,Robock(1983)给出了一个政治风险的详细定义: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政治变化的原因,经营环境发生难以预料的不连续性。Robock(1983)进一步说明不能导致经营环境变化的政治环境的波动不能被视为政治风险。Shawtah(2013)认为,政治风险是将商业目标和战略代入不利方向的政治事件。Gabor 和 Kudrna 等学者(2013)将政治风险定义为由于当局的政策行动使投资遭受损失的风险。世界银行将政治风险定义为公司的运营因受到政治力量或政治事件影响而中断的可能性,在东道国内部,政治风险往往由政府、政治组织、少数团体、分离主义组织等的行为的不确定性所引起。可以看出,以上对于政治风险的定义包含三个基本方面:①由东道国政治当局的行为所引起;②使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发生不利变化;③对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带来不利影响。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和“主权风险”(Sovereign Risk)在文献中也经常出现,用来表示国际贸易中在国外经营中的风险。“国家风险”是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层面发生的威胁到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的经济政治事件,而这种事件一般是由公司或行业的外部力量所导致的(Robock, 1983)。“主权风险”通常发生于东道国的国家层面(Oetzel, 2005),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行为或不作为所导致的(Henisz & Zelner, 2003)。

2) 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政治风险的成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既可能来自于东道国国内,也可能源于跨国企业的母国、第三国及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东道国政府与跨国企业双方的相对议价能力(Haner, 1979; Ramamurti, 2001)。从国家层面来看,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东道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稳定性、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文化差异和宗教信仰、语言的多样性,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许多因素的影响(Khattab, et al., 2007; Jose & Neckar, 1988; Howell & Chaddick, 1994),López 和 Vidal(2013)的研究显示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政治风险也受到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如贸易争端、禁运及制裁、东道国与母国、周边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等(Quer, et al., 2012; Ring, et al., 2005; Alon & Martin, 1998; Agarwal & Feils, 2007)。从行业层面来看,不同行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不尽相同,行业的竞争度、成熟度、集中度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都影响到其政治风险水平的高低

(Kennedy, 1988)。从微观层面而言,企业及项目的特性也都会影响到其所承受的政治风险水平,如企业的国籍、背景和文化、企业及其子公司的区位规模和技术水平、子公司在东道国所处的区位、企业的资本结构、国际化程度和本地化程度,以及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社会组织及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影响企业的政治风险水平的因素(Ashley & Bonner, 1987; Jose & Neckar, 1988; Kesternich & Schnitzer, 2010; Benesova & Anchor, 2013)。国际工程项目本身的一些内在特性,如项目的规模大小、工期长短、资金来源、合同条件、技术和管理的复杂性等也是影响其政治风险水平的重要因素(Quer, et al., 2012; Ashley & Bonner, 1987; Baloi & Price, 2003; Ozorhon et al., 2010)。

3) 政治风险评估

现有的对于政治风险的评估多集中于国家宏观环境层面。一些国际权威机构发布了相关的评估报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国际国家风险指数(ICRG)、商业环境风险评估公司(BERI)、经济学人杂志智库(EIU)和欧洲货币论坛(Euromoney),以及一些其他主要评级机构,包括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这些评级机构的评价都基于相关变量的权重设置。虽然这些评级机构将其评价内容命名为国家风险,但他们都把政治风险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权威政治风险评级机构及评级内容

指标	内 容
ICRG	包含 3 个次级指标,分别是政治风险指标(100 分)、财务风险指标(50 分)和经济风险指标(50 分)
BERI	其中政治风险被着重强调,具体指标包括:政治势力及权力、限制性措施、民族与宗教势力、意识形态、社会情况、极左势力、敌对国家
EIU	以 7 年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包含众多指标,对众多国家进行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评级
Euromoney	主要指标包括:政治风险(30%)、经济表现(30%)、资本市场(10%)、贴现损失(10%)、信用等级(7.5%)、债务(7.5%)、债务违约(5%)

国内则从 2005 年之后,有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该指数对 100 多个国家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政策风险和支付风险四个方面分析国际贸易投资风险状况;以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该报告对全球 190 多个主权国家的风险水平进行评估。从行业层面来看,对政治风险的评估则主要有金融行业的 CAMEL 模型(Belcsak, 1987)、美国银行模型(Howell, 1998)、石油行业的 IHS 模型等(Prasad, et al., 2012)。此外,一些大型的跨国企业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指标和体系,如荷兰的壳牌集团、英国石油公司、美国的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Mortanges 和 Allers (1996),Agarwal 和 Feils(2007)以及 Khattab 等(2008)分别对加拿大、荷兰、约旦的一些跨国公司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评价。Tsai 和 Su(2005)则对东亚五大港口经营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Bjelland(2012)对利比亚石油行业的关键政治风险因素进行了识别和评估。Agliardi 等(2012)对新兴国家投资市场的政治风险指数进行了研究。Sottilotta(2015)对比和分析了经合组织、EIU、BERI 等多个机构的政治风

险评级系统对“阿拉伯之春”(2010年开始发生在阿拉伯世界,波及多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预测能力,指出这些机构的政治风险评级系统的预测能力有限,并提出对政治风险的评估应具有更多的前瞻性,体现出更多的地域特点。

4) 政治风险管理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风险的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Mohamed(2012)对埃及的 PPP 项目的政治风险分担进行了研究。Hainz 和 Kleimeier(2012)指出在政治风险较高的环境下,使用开发银行贷款以及无追索的项目融资方式可以缓和政治风险。Moen(2012)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研究了政治风险的转移。Bharathy 和 Silverman(2012)应用社会系统模型对政治风险管理进行了研究。Braga-Alves 和 Morey(2012)的研究显示,较高的政治风险对企业提高其治理水平具有驱动力,且企业较高的治理水平可以有效降低政治风险。Jiménez 和 Delgado-García(2012)指出,对政治风险的主动的、前瞻性的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公司业绩。Luthans 和 Doh(2003)则建议可以从提高企业相对议价能力(Relative Bargaining Power),以及保护和防御的两种途径来控制政治风险。Lai(2002)将政治风险的 30 个管理措施归为被动的、温和的和主动的三类。Hillman 和 Hitt(1999)构建了基于途径、参与水平和战略的三维选择模型。Alon 和 Martin(1998)分析了在较高政治风险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跨国企业宜采取低风险进入模式,如可以采用移动进入模式而不是永久进入模式。Kennedy(1988)针对政治风险管理提出了包括适应、游说、分享、服务和回避五种政治风险策略。Conway(2013)研究了跨国公司关注东道国政府行为以及管理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关系对降低政治风险的重要意义。Putte 等(2012)指出石油和天然气投资由于大多在非经合组织成员国且属于资金密集型,面临了巨大的政治风险,以及如何通过政治风险投保来规避和缓和政治风险。Iftinchi 和 Hurduzeu(2016)探讨了政治风险保险在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并指出政治风险保险的局限性表现在市场波动性、高溢价率和低收益三个方面。还有其他学者对政治风险的担保、联营体方式和本地化策略等进行了探讨。

上述这些对于政治风险的研究多立足于一般国际业务,其研究对象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跨国企业(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和国际联营体(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IJVs),其研究层次多为国家和行业层面。

5) 建筑行业政治风险研究

相比国际贸易中对政治风险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针对建筑行业或工程项目的政治风险的研究显得极为匮乏。Ashley 和 Bonner(1987)分析了政治风险的来源及其对于项目实施的现金流的影响。Wang 等(2000)探讨了中国的 PPP 项目实施中涉及政治风险的相关合同条款。Khattab 等(2008)分析了约旦的国际工程项目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并指出东道国社会及国际关系是影响政治风险水平的重要因素。Ling 和 Hoang(2010)分析了国际承包商在越南所面临的政治、法律和经济风险。Smith 和 Gannon(2008)及 Voelker 等(2013)则分别对英国的 PPP 项目和印度尼西亚的电力项目的政治风险状况进行了分析。对于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模型方面,则有神经网络模型和 QQIR 模型。Goedert 和 Sekpe(2013)给出了一个考虑政治风险因素的工程项目的实施计划制定方法的基本框架。Deng 和 Low(2013)对政治风险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从国际环境、东道国、产业、项目和承包企业五个方面共计识别了 85 个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而对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并以中国承包商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Deng 等学者(2014)通过因子分析识别出三个